

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

李宇明¹ 陈前瑞²

提要 本文以定量的方式考察北京话中有标记被动句的使用情况, 进而了解“给”字被动句在当代北京话中的地位。文章还考察了“给”字被动用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制约因素, 认为北京话中的介词“给”是在助词“给”的诱导下逐步发展出被动用法的。

关键词 北京话; “给”; 被动; 语法化

壹 引言

《现代汉语八百词》列举了“给”同被动相关的三种用法:

- (1) 门给风吹开了
- (2) 杯子给打碎了一个
- (3) 杯子叫我给打碎了一个

例(1)中“给”相当于介词“被”的用法, 太田辰夫(1956)认为, 这种用法北京话里是没有的, 可是在普通话里是普遍承认的。山田忠司(1998a、1998b)调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的作品, 发现除个别零星用法外, 这些作品中几乎没有介词“给”的被动用法。然而徐丹(1992)、周一民(1998)则确认北京话存在介词“给”的被动用法。不同研究者的不尽相同甚或截然不同的看法, 其实反映的是北京话“给”字被动句从无到有的萌生发展过程。

蒋绍愚(2002)指出, “给”从表示“给与”到表示“被动”是这样一种发展: “给₁”(给予) → “给₂”(让、叫) → “给₃”(被)^①。木村英树(2005)认为, 上述发展路径应是广东话类型的发展路径, 而北京话类型以“给予”义为起点的被动发展路径应是: 给予 → 受益 → 被动。

“给”义动词的使役用法, 南方方言多见而北京话少见^②, 语法化不大可能发生在一种不常见的用法上。Bennett(1981)认为“给”经由处置发展为被动, 蒋绍愚(2002)质疑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就是在汉语的历时语料中极少见到用“给”来表示处置的。李炜(2004b)认为, 北京话介词“给”被动用法的发展, 可能受到了南方官话的影响。

例(2)的助词“给”与助词“被”接近, 例(3)中助词“给”的用法由于前头有被动介词“让”而主要起强调作用。佐佐木勳人(1996)、王彦杰(2001)、张谊生(2002)、李炜(2004a、2004b)等对助词“给”也有所研究, 但对于助词“给”的发展以及它同介词“给”被动用法发展的关系还研究不够, 对“给”字被动句在当代北京话中的地位还缺乏清晰的描画。

本文以定量的方式考察北京话中有标记被动句的使用情况, 进而了解“给”字被动句在当代北京话中的地位, 探究“给”被动用法的发展阶段及其内在制约因素。

贰 “给”字被动句在当代北京话中的地位

* 本文曾在汉语被动表述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 华中师范大学)上宣读, 得到与会者的指正。本次发表吸收了《方言》编辑部提出的重要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蒋先生指出的这一发展路径, 可以得到《白姓官话》的支持。但是濑户口律子(1994), 濑户口律子、李炜(2004)认为, 《白姓官话》反映的是南方官话的特点。

^② 山田忠司(1998)、李炜(2002)的研究基本支持这一观点。

2. 1 北京话中九种有标记被动句式

北京话被动句的标记有“被、叫/让、给”三类，分别构成“被”字被动句、“叫/让”被动句（含“让”字被动句和“叫”字被动句）和“给”字被动句。“被、叫、让、给”后面可以带施事形成“被动标记+NP+VP”这样的“长被动句”，“被、叫、给”也可不带施事直接加在动词之前，形成“被动标记+VP”这样的“短被动句”。^①长被动句和短被动句共有六种句式：

- I. 被+NP+VP
- II. 被+VP
- III. 叫/让+NP+VP
- IV. 叫+VP^②
- V. 给+NP+VP
- VI. 给+VP

这六种被动句式均可单用，其中 I、III、V 这三种长被动句还可以同 VI 混合使用，即分别加“给”形成三种复合被动句式：

- VII. 被+NP+给+VP，如“被人给打了”。
- VIII. 叫/让+NP+给+VP，如“让人给灭了”。
- IX. 给+NP+给+VP，如“早给日本人给抓走啦！”（老舍《四世同堂》）。

这样，不计带有文言色彩的“为”字被动句，北京话中的有标记被动句就有以上九种。

2. 2 各类被动句式的使用情况

张伯江、方梅（1996：16）认为，王朔小说的语言是当代北京口语的真实代表，它与以老舍作品为代表的老北京话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以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中收录的王朔小说为语料基础，^③考察当代北京话中有标记被动句的使用情况，重点考察在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中的使用情况。

北大语料库的王朔作品中，“被+NP+VP”为 823 例，“被+VP”为 502 例，两者之比为 1.64：1。^④根据抽样统计的原则，从“被+VP”与“被+NP+VP”各选序号尾数为 1 的例句 51 例，统计两者在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中的使用情况。其中“被+NP+VP”用于对话的有 15 例，而“被+VP”只有 3 例，差别非常明显。

表一 各种被动句式在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中的比例

被动句种类	对话与叙述的比例	合计
VIII. 叫/让+NP+给+VP	4: 0/15: 1	20
III. 叫/让+NP+VP	46: 5/63: 7	121
VI. 给+VP	20: 21	41
I. 被+NP+VP	15: 36*	823
V. 给+NP+VP	2: 12	14
II. 被+VP	3: 48*	502

注：带*号的比例为所抽样本中的比例。

表一是各类被动句式在对话与叙述中的原始数据。观察发现：

第一，北京话九种被动句式中，“叫+VP”、“被+NP+给+VP”、“给+NP+给+VP”等

^① 有关长、短被动句的问题可参见邓思颖 2003：166 的相关讨论。

^② 吕叔湘（1980：268）指出这种句式很少使用。

^③ 容量为 2.80MB。

^④ 张谊生（2002：345）对四卷本《王朔文集》的统计结果是，“被+NP+VP”与“被+VP”的用例分别为 334 与 181，用例之比为 1.85：1，与本文的统计结果比较接近。

三种未发现实际例证, 这说明IV、VII、IX这三种被动句式使用频率很低。^①

第二, “被、叫/让、给”三类被动标记在书面作品中的使用比例(不含复合被动句式)为1325: 121: 55。这说明作为被动标记, “被”最常用, “叫/让”少用, “给”的使用频率更低。

第三, 长被动句、短被动句和复合被动句三者的使用比例为958: 543: 20。这说明长被动句是常用的被动句式, 短被动句次之, 复合被动句的使用频率很低。

第四, 上表六种被动句式, 在人物对话中的使用比例自上而下依次降低, 说明这些句式的口语色彩不同, 根据口语色彩的强弱可以排出如下序列: VIII>III>VI>I>V>II。就“给”字被动句式而言, “叫/让+NP+给+VP”、“给+VP”、“给+NP+VP”三者的人物对话与叙述语言中的使用比例为19/1、20/21、2/12, 可见其口语色彩依次减弱, “给+NP+VP”的口语色彩最弱, 主要用于叙述语言之中。下面三个带“给”的例句都出现在人物对话中, 但其口语色彩仍有差异, 不同被动句所体现的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与情绪依次减弱:

- (4) “万能的主呵, 我这点嗜好怎么全叫你给揪出来了。”
 (5) 赵航宇愣神望着天花板, “脸是有了, 饭碗却给砸了。”
 (6) “我这车已经给人包着呢。今天没事, 出来拉几趟。”

2. 3 “给+VP”的多义性理解

“给+VP”的表义大致可分三类: 表被动, 表受益, 表处置。它们之间无明显形式区别, 须根据上下文还原意义。首先区分被动与主动, 然后在主动中再区分处置和受益。表被动的“给+VP”中的“给”可替换为“被”, 表处置的可替换为“把”, 表受益的可替换为“为、替”等, 三者都可以补出介词的宾语。^②

“给+VP”的被动用法不出现施事成分, 易于判断。比如:

- (7) 这孩子是给饿坏了。

《现代汉语八百词》把助词“给”用于被动句的情况分为两例: a) “被”字句, 如“杯子叫我给打碎了一个”。^③b) 非“被”字句, 如“杯子我给打碎了一个”。a句即本文所说的复合被动句, 施事前有被动标记。b句中受事(“杯子”)处在句首位置, 施事(“我”)出现且施事之前没有典型的被动标记, “给”是加在动词之上的, 施事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和句法位置均没有发生变化。陆俭明(2002)就曾指出, 汉语中有些类似的句子(如“我的杯子弟弟打破了”与“我的杯子打破了”)很难只根据句子形式判定它们是句法移位, 还是语用移位。笔者认为, 对“杯子我给打碎了一个”之类的句子, 可把“杯子”看作话题成分, 不把它看作被动句。这里把此类句子看作处置意义, 即“杯子我给把它打碎了一个”^④, 处置对象被省略并可以补回。

^⑤ (8)、(9)两例的“给”也分析为处置意义:

- (8)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给忽略了?
 (9) 你今天值日你给忘了。

下面两例中, “给”所在小句的施事承前省略, 所以分析为处置。不过由于施事和受事都有可能承前省略, 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分析为被动。可见助词“给”的被动用法和处置用法联系非常密切:

- (10) “……怎么着? 你们到底要不要? 别老摩挲着看个没完, 光笑不说话都给摸小了。”
 (11) “什么意思, 是不是李白玲和张燕生你也没抓到?” “抓了, 又给放了。”

助词“给”表受益的用法比较容易确定, 例如:

- (12) 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

^① 张谊生(2002)干脆就认为“给+NP+给+VP”不能说。

^② 张谊生(2002)把被字句与把字句之外的带助词“给”的句子称为“为动句”, 并认为为动句的表义倾向可以分为受益和受损两大类; 就为动句的表义基点而言, 又可分为施与和承受。

^③ 例句不是“被”字句, 《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和1999版原文如此, 且其他例句也没有“被”。

^④ 小字号的“把它”为语义注释, 下同。

^⑤ 李炜(2004a)持同样观点。

(13)是你们给开的门吧?

统计显示,王朔小说中“给+VP”表受益、表处置、表被动的用例是 32: 25: 41。“给+VP”的被动理解占据一定的优势。

叁 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发展过程

为了考察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发展,本文重点分析《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小额》(1908)、《四世同堂》(创作于 1945—1948)、王朔小说等语料,^①在此基础上把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

酝酿阶段: 18 世纪中前期(《红楼梦》)

萌芽阶段: 19 世纪中期—20 世纪初期(《儿女英雄传》、《小额》)

推展阶段: 20 世纪中前期(《四世同堂》)

成形阶段: 20 世纪中后期(王朔小说)

3.1 酝酿阶段(《红楼梦》)

酝酿阶段以《红楼梦》为代表,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给+NP”虽可以有使役、被动两解,但还不是典型的被动用法(蒋绍愚 2002),介词“给”只是开始酝酿被动用法,例如:

(14) 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红 52 回)

第二,“给+VP”仅发现 4 例,全都表受益。例如:

(15) “……便是回来有人带信,那都是不中用的。不过口里应着,他倒给带呢!”(红 24 回)

(16) 等年下太太给作的时节我再作罢,只当你还我的一样。(红 51 回)

(17) 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红 61 回)^②

(18) 当着奴才们,奶奶们素日何等的好来,如今还求奶奶给留脸。(红 68 回)

例(15)可理解为“给你带信”或“让人给你带信”,例(16)—(18)的“给”后都可以补出受益者。山田忠司(1998a)、张谊生(2002)在《红楼梦》中均未发现此种现象^③,说明“给”的这种用法确实稀少,不引人注意。但是,助词“给”的出现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助词“给”的被动用法进入酝酿期。

第三,“把/叫+NP+给+VP”的用法还没有出现(李炜 2004a)。这说明复合处置或被动句中“给”的助词用法要落后于“给+VP”的表受益用法。

3.2 萌芽阶段(《儿女英雄传》、《小额》)

萌芽阶段以《儿女英雄传》、《小额》为代表,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给+NP”虽有使役、被动两解,但仍然不是典型的被动用法。例如:

(19) 就是天,也给气运使唤着,定数所关,天也无从为力。(儿 3 回)

江蓝生(2000)、蒋绍愚(2002)等许多先生都认为,例(19)是《儿女英雄传》中唯一的介词“给”的被动用法。笔者认为,这一孤例也许并不可靠,其中“给”虽然勉强可以理解为“被”,但结合后续小句,似乎更应理解为“听任、由”;而“听任”与“容许”、“致使”一样

^① 语料主要从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的电子文本中检索。《红楼梦》参校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2 版(以庚辰本为底本),《儿女英雄传》参校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小额》参校《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所载的标点文本。《四世同堂》参校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前后出版的《老舍文集》中的相关卷册。所引例句的出处仅以上述作品的首字来标识。

^② 该例是石毓智(2004)发现的。

^③ 山田忠司(1998a)所选的版本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的版本,据查该版本也有这 4 例。

也是一种使役意义, 只是语义较弱, 主语的自主性不强(后续小句有“无从为力”)。如果这样理解, 就可以跟下面一个例句, 获得一致性的解释, 其中的“甘心”更排斥后续小句的被动理解:

(20) 甘心卑污苟贱, 给那恶僧支使。(儿3回)

江蓝生(2000)曾经提出使役句转化为被动句的三个条件: 1) 主语为受事; 2) 役使动词后的情况是已经实现的; 3) 谓语动词是及物的。例(19)也不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 它陈述的是一般的规律、看法, 或是一种态度, 其体貌不像是完成、实现或完整体, 而是类似于未完整体(小句带有“着”)。也看不出受事受到怎样一种明显的影响或结果, 没有什么明显的状态变化, 而只是处于一种弱的致使关系之中。因此, 例(19)虽有被动意味, 但是还不典型, 顶多只能算是被动用法的萌芽。

第二, “给+VP”虽然表受益, 但也有少数表处置和表被动, 其中处置用法多于被动用法。

《儿女英雄传》中受益、处置、被动三者用例分别是 28、6、2, 《小额》中三者用例分别是 57、7、3。例(21)、(22)是处置用例, 例(23)、(24)是被动用例。

(21) 杯已是飞出门儿去了, 这个当儿, 忽然梦想不到来了这么个人, 双手给抱住了。(儿31回)

(22) 这天跟小文子儿又说岔了, 登时有人给劝开啦。(小)

(23) 不信, 瞧我这袖子, 也给弄了那么一块。(儿38回)

(24) 钱闹了五十多荡(三百多吊钱), 病倒算给治好啦。(小)

第三, 表处置的“把+NP+给+VP”开始出现, 而且用例不少, 《儿女英雄传》中多达 18 例^①, 《小额》中也有 15 例。但是, 表被动的“叫+NP+给+VP”在《儿女英雄传》中只有 2 例, “让+NP+给+VP”在《小额》中发展到 17 例。例(25)、(26)分别为处置和被动用法。

(25) 只差了没把我的肠子给恹断了, 肺给气乍(炸)了!(儿32回)

(26) 在南苑喝醉了骂帮操, 让人家给驳啦。(小)

比较助词“给”在“给+VP”与在复合处置句/复合被动句中的用法, 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 助词“给”的被动用法的萌芽已经明显显露, 只是助词“给”的处置用法多于并很可能先于被动用法。对此, 李炜(2004a)也持同样观点。

3.3 推展阶段(《四世同堂》)

推展阶段以《四世同堂》为代表, 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 “给+NP+VP”个别用例虽然可以有被动理解, 但仍然不够典型, 不构成语法规则。《四世同堂》没有这种用法。山田忠司(1998a)在《骆驼祥子》中发现的下例被动用法, 笔者认为其中的“给”仍可能保留主动的意味(前一小句的“进”为自主动词), 不够典型。

(27) 他几乎觉得没脸再进人和厂, 而给大家当笑话说……(《骆驼祥子》)

第二, “给+VP”的受益用法仍占主导(75例), 但是被动用法(14例)开始多于处置用法(3例), 显示“给+VP”新的表义重心开始转移, 从处置推展到被动。

第三, 在各类复合被动句式, 带“教/叫”的 41 例, 带“让”的 6 例, 另有“被+NP+给+VP”28 例, 显示复合被动句的标记开始从口语色彩中的“教/叫、让”推展到书面语色彩的“被”并具有能产性, 并进而推展出零星的“给+NP+给+VP”(《四世同堂》与《二马》各 1 例)。这说明在当时的北京话中, 复合被动句已产生类推效应, 介词“给”首先在复合被动句中明确无误地表示被动, 而且复合被动句的用例明显多于复合处置句(8例), 这一发展趋势与“给+VP”是一致的。例如:

(28) 他们的口都被耻辱给封严。(四)

(29) “她, 早给日本人给抓走啦!”(四)^②

^① 李炜(2004a)在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的版本中发现 17 例。

^② 山田忠司(1998a)首先引用该例, 但山田忠司(1999)却遗漏了第二个“给”。

(30) 他开开门进来, 差点给门轴给推出了槽。(《二马》)

3. 4 成形阶段(王朔小说)

成形阶段以王朔小说为代表。正如前面讨论的, 在王朔小说中, “给+NP”可以直接表被动(14例), 主要用于叙述语言; 且“给+VP”作被动理解的明显超过作受益、处置理解的, 这标志着助词“给”的被动语感得以建立。有意思的是, 复合被动句明显减少, 仅为《四世同堂》的1/3。

北方作家作品中出现表被动的介词“给”大约是在20世纪50年代。李炜(2004b)从京味作品《评述聊斋志异》(1954)也只发现1例介词“给”的被动用例; 并且发现王朔作品《看上去很美》(1999)中表被动的“给”的用例是《我是你爸爸》(1992)中的用例的近5倍。笔者从《红旗谱》(第一卷)^①检得4例, 但是其NP均为“猫”, 均出现在对话中, 可见该用法并不普遍。下面仅举一例:

(31) 大贵说: “咳! 甭提了, 咱的脯红给猫吃了, 快去看看吧!”(《红旗谱》)^②

肆 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发展路径

4. 1 助词“给”对介词“给”的被动用法的诱导

有关“给”的被动用法的发展途径, 蒋绍愚(2002)和木村英树(2005)先后提出了两种相对看法。除此之外, 本文的材料可以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思考:

第一, “给+VP”的理解具有多义性, 从18世纪中叶受益的绝对优先理解, 到19世纪中叶以后发展出处置相对于被动的优先理解, 最后在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为被动的优先理解。“给+VP”的语义发展似可概括为: 受益→处置→被动。

第二, 在“给+VP”的基础上发展出复合处置格式, 而复合处置格式“把+NP+给+VP”进一步带动复合被动格式“叫/让+NP+给+VP”的产生, 使19世纪中叶以后得助词“给”不仅可以与处置意义共现共存, 也可以与被动意义共现共存。简而言之, 助词“给”所在复合格式的意义发展为: 处置→被动。反过来, 两类复合格式的相继发展又有可能进一步促成“给+VP”的语义分化, 使其处置与被动理解在不同时期相继凸现。

第三, 由于“叫/让+NP+给+VP”的类推作用, “被+NP+给+VP”与“给+NP+给+VP”得以产生, 介词“给”可以用于复合被动句中明确表示被动关系。尽管两个“给”重复使用的现象只是昙花一现, 但这种双重标记现象对语言心理和语言发展的预示作用不可忽视: 介词“给”的被动用法很有可能首先出现在复合被动句中, 而复合格式中助词“给”一旦简化, 介词“给”便独立承担被动功能。王朔小说中各种复合被动句在明显减少, 似乎也初步支持这一点。

张谊生(2002: 332)曾认为, 有关“盘子我给打碎了”、“问题我给解决了”一类句子, 它们也是一种经过省略、替换、位移后形成的特殊强调格式, 其转换轨迹大致如下: 盘子给我打碎了→盘子给打碎了→盘子被我给打碎了→盘子我给打碎了。本文的历时分析, 似乎不支持这种转换轨迹, 因为在北京话中“盘子给我打碎了”远远落后于其他句式, 且李炜(2004a)在《儿女英雄传》中就发现了7例“N受事N施事给VP”。

第四, 同样由于类推作用, “被/教/让+NP”格式的大量使用, 进一步促使“给+NP”的单独使用。这一点也正是蒋绍愚(2002)所强调的, 但类推得以发生的语义基础和已有语料基础可能是多样的。

^① 出版于1958年, 作者梁斌, 河北保定人。

^② 李炜(2004b)从京味作品《评述聊斋志异》(1954)也只发现1例介词“给”的被动用例。李炜(2004b)且发现王朔作品《看上去很美》(1999)中表被动的“给”的用例是《我是你爸爸》(1992)中的用例的近5倍。

最后, 当代北京话的介词“给”既有被动用法, 也有处置用法, 这一现象在许多方言里也有所表现(石毓智 2004)。石毓智(2004)还讨论了表被动和处置的介词“给”产生的语义基础和句法环境。比较前面第一点和第二点, 发现北京话中介词“给”与助词“给”都有处置与被动两种用法, 只是助词“给”的被动用法的发展比介词“给”的发展领先一些, 而北京话中介词“给”的被动用法与处置用法之间的先后关系或发展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上述五点来看, 北京话中的介词“给”是在多种句式中的助词“给”的诱导下, 结合自身的语义基础和句法环境, 逐步演变出被动用法。另外, 南方官话长期存在的介词“给”的被动用法及其对现当代书面作品的影响, 也可能进一步促使介词“给”的被动用法加速进入当代北京话口语之中(参见李炜 2004b)。

4. 2 助词“给”的性质

如前所述, “给”可以出现于三种被动句式: V. 给+NP+VP; VI. 给+VP; IX. 给₁+NP+给₂+VP。其中IX中的“给₁”能用“被、叫、让”替换, 跟V中的“给”一样是典型的被动标记。VI中的“给”与IX中的“给₂”则是非典型的被动标记, 在前文的共时统计与历时分析中都称为助词“给”, 分析发现两者具有较多的一致性:

第一, “给₂”先出现在“把”字句, 后出现在被动句中, VI也是处置理解先占优势, 说明两者不仅有类似的多义理解, 而且可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

第二, IX中“给₁+NP”省略, 就能直接形成“给+VP”, 比如“早给日本人给抓走啦”可省略成“早给抓走啦”。

第三, 由于表被动的介词“给”在“给+VP”大量出现的时候还迟迟没有出现, 所以从共时的角度来看, VI. “给+VP”中的“给”只能趋近于IX. 给₁+NP+给₂+VP中的“给₂”而不是“给₁”。

两者也有不同之处。“给₁+NP+给₂+VP”中的“给₂”后面可以勉强补回“他”, 构成“早给被日本人给把(他)抓走啦”之类的杂糅结构, 从而显现处置意义; 而“早给抓走啦”中的“给”在受事成为主语的情况下只能是被动意义, 只能添加施事, 除非改变句子的主语。比较而言, “给+VP”中的“给”的被动意义相对稳定而明确, 而“给₁+NP+给₂+VP”的“给₂”只起辅助与强调被动的的作用。

正因为助词“给”具有较多的一致性, 所以邓思颖(2003: 193)把各种用法的“给+VP”中的“给”概括为受影响的标记(affectedness)而不是被动标记, 单从共时的角度来看,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解释的覆盖面较广。不过, 从历时的角度看, 这种看法不便于准确地解释“给+VP”的优势理解从表受益、处置到表被动的发展过程, 也不便于准确地解释共时系统中“给+VP”的多义性。因此, 本文倾向于把所谓的影响标记看作一种上位的标记, 而把受益、处置、被动看作助词“给”的下位的语义功能。张伯江(2001)认为“把/被句”蕴含强影响性, 该观点也支持本文的处理方法, 因为即便是标准的被动句也具有明显的影响性。

伍 余言

本文初步追踪到了“给”的被动用法在北京话中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 我们也想知道, “给”的被动用法, 特别是介词“给”的被动用法, 在北京话之外的北方话或整个北方话中的发展过程。比如, 太原话的“给”表示遭遇时, 一般不出现施事(沈明 2002),^①而乌鲁木齐话的介词“给”可以表被动, 助词“给”则不可以直接表被动, 但却可以用“让”, 如“杯子让打碎咧一个。”(周磊 2002)当代北方话中表被动的“给”在共时方面的这些变异, 是受哪些因素制约的, 很值得进一步思考。如果对这些制约因素有一定的了解, 就有可能对表被动的“给”

^① “一般”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的各种句式在现代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的生成关系提出新的看法。^①

参考文献

- 邓思颖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江蓝生 1989 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中国语文》第5期：370—377
- 江蓝生 2000 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 2002 “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59—177
- 濂户口律子 1994 《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濂户口律子、李炜 2004 琉球官话课本编写年代考证，《中国语文》第1期：77—84
- 李 珊 1994 《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 炜 2002 清中叶以来使役“给”的历时考察与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62—66
- 李 炜 2004a 加强处置/被动语势的助词“给”，《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55—61
- 李 炜 2004b 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兼及“南方官话”被动的“给”，《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35—40
- 陆俭明 2002 汉语句法研究新思考，《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63—278
-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木村英树 2005 北京话“给”字句扩展为被字句的语义动因，《汉语学报》第2期：14—22
- 齐沪扬 1995 有关介词“给”的支配成分的省略的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83—89
- 桥本万太郎 1987 汉语被动句的历史·区域发展，《中国语文》第1期：36—49
- 山田忠司 1998a 北京語における「给」の発達について——『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作品をめぐって，《大阪産業大学論集 人文科学編》96号：51—61
- 山田忠司 1998b 機能語“给”の用法について——老舍作品をコーパスとして，東京外国語大学中国言語文化研究会《中国言語文化論叢》第2集：55—79
- 山田忠司 1999 《儒林外史》における“给”用法——北京語資料の比較とから，《中国語学》246号：22—30
- 沈 明 2002 太原话的“给”字句，《方言》第2期：108—116
- 石毓智 2004 兼表被动和处置的“给”的语法化，《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15—26
- 太田辰夫 1956 “给”について，《神戸外大論叢》第7卷第1—3集：177—197
- 王彦杰 2001 “把……给V”句式中助词“给”的使用条件和表达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64—70
- 吴丽君 2003 《琉球官话课本研究》述评，《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109—112
- 徐 丹 1992 北京话中的语法标记“给”，《方言》第1期：36—49
- 张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中国语文》第6期：519—524
- 张谊生 2002 助词“给”及相关句式，《汉语学报》2001年上卷第3期，（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4—33
- 周 磊 2002 乌鲁木齐话“给”字句研究，《方言》第1期：16—23
- 周一民 1998 《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北京）语文出版社
- 佐佐木勳人 1996 “被……给”と“把……给”——強調の“给”再考，《中国語学》243号：65—74
- Bennett. P. A. 1981 The evolution of passive and disposal sentenc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9: 61—90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passive “*gei*” structures in Peking Dialect

Key words: Peking Dialect passive *gei* grammaticalization

^① 详见齐沪扬（1995）、张谊生（2002）、邓思颖（2003）。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ing the status of passive “*gei*” structures in Peking Diale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usages of all the marked passive structures in narrative and conversation of contemporary novels.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passive “*gei*” structures in Peking Dialect, and finds that the preposition passive “*gei*” is introduced by particle passive “*gei*” in the structure of “passive mark + NP + *gei* + VP” and “*gei* + VP”.